

# 乡贤文学重构的媒体路径研究

——以《白鹿原》为考察中心

周 凯 王 琳

**内容提要** 乡贤文学作为从乡贤文化中孕育而出的文学类别,因其对极具地域特色的习俗风貌的展示和对乡土文化中精神内核的深刻挖掘,从诞生之初就一直拥有大量拥趸者。用多种形式充分发扬乡贤文学的价值既是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又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承担的责任,各类媒体毫无疑问成为演绎乡贤文学的平台。文学影视化是文学语言向视听语言转化的过程,这种重构必然要考虑到媒体自身固有的属性和特点。本文以乡贤文学的代表作《白鹿原》为例,重点分析族长白嘉轩这一乡贤的形象,探究乡贤文化重构的媒体路径,并提出改良建议。

**关键词** 乡贤 乡贤文化 《白鹿原》 白嘉轩

周 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210093

王 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210093

## 一、乡贤与乡贤文学重构的时代土壤

本文所谓乡贤,主要指旧时乡村中德行高尚、饱读诗书、具有崇高威望的人。这类人往往耕读传家、办事公道、能力出众,是在乡里主持公共事务、执行风俗教化的领头角色,是整个宗族的“家长”或“长老”。在中国古代,交通工具并不发达,加上安土重迁的农耕思想,星罗棋布的村庄在辽阔的国土上是相互隔绝的。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很难触及到基层,由此便形成了乡贤自治的局面<sup>[1]</sup>。而所谓乡贤文化,就是围绕着乡贤这一角色中最引人称道的以德服人、勤俭持家、维持乡村秩序、热心公益等优良品质形成的思想形态和治理理念。

乡贤文学总体可归为乡土文学的一部分,它并不是文学固有分类和专有名词,而是如今“新乡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子课题“乡贤文化的文学传播”阶段性研究成果。

[1]王先明:《乡贤:维系古代基层社会运转的主导力量》,《北京日报》,2014年11月24日第19版。

贤”成为热词后,研究者将原来乡土文学中重点突出的乡贤形象从文学作品中剥离出来,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新分类。《白鹿原》是乡贤文学的代表作。作者陈忠实以白鹿村族长白嘉轩为叙事核心,以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的恩怨纠葛为主线情节,叙述了白嘉轩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坚守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以维持乡村秩序,却在时代洪流和政治运动中无可挽回地走向颓败的故事。

乡贤古以有之,但乡贤文学起溯于上个世纪20年代,由最初对乡土人情的单纯描绘发展成为对乡人命运的刻画,因而具备了较强的感染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播方式的日新月异,读者开始不满足于只能从纸上感受到乡村的生死和泥土的气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文坛兴起了“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为乡贤文学的改编再创作提供了大量小说原本。

最近几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影响和冲击,中央对农村空心化问题倍加关切,提倡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退休干部、能人富贾重回乡村,成为“新乡贤”,带动乡村发展建设。“新乡贤”的提出是一个发扬乡贤文学的机遇,加上也需要让大众了解乡贤精神推进农村建设,乡贤文学的改编重构再次摆在了眼前。媒介形态的多样性为这次重构提供了多种可选择的平台。乡贤文学在这些媒体上应该怎样重构是关乎改编效果的重要问题。下面以《白鹿原》中白嘉轩的形象为例,探究其已有的重构路径,并提出建议。

## 二、“白嘉轩”形象的建构路径

1. 连环画 李志武的绘本连环画《白鹿原》于2002年10月出版,是原小说唯一一部连环画改编作品。当时,连环画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已经过了创作的黄金时期,然而作者小时候是一个连环画迷,决定寻找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进行绘制,完成儿时的梦想。从小生活在陕北县城的经历,让其选择了《白鹿原》这部作品。连环画《白鹿原》运用黑色线条以素描的笔法进行勾勒。绘画语言在重构小说的时候最大的难度在于对生活场景、人物形象的再现和人物心理的展示。窑洞里的陈设应该是什么样?白嘉轩的长衫是什么款式?怎样绘画能够体现他的威严?李志武除了搜集相关图书资料,又到白鹿原实地对当地的建筑风格、服饰穿戴进行拍摄,以备在创作时提供参考。

从成书来看,这本连环画对白嘉轩的刻画采用了粗线条、大笔泼墨的手法,直线流畅、率直,整齐利落,始终如一,使他的服饰看起来朴素整齐,神情少于变化,突显其一生稳重的行事风格。在表现他悲痛的情绪时,有意回避正面表情,采用曲线线条勾画出佝偻的身躯,用人物背影的特写突出苍凉之感<sup>[1]</sup>。整体笔触简朴,配合黑色大面积阴影营造出了整个角色饱经沧桑的厚重,很好地传递了原著质朴苍凉的味道。连环画并不注重画出白嘉轩的面部表情,全篇着重通过他的动作和姿态,包括身躯的曲直,来表现出他对道德礼教的守卫。

连环画和小说一样,以书为媒,但因绘画语言的特殊性形成独自的语言特质和审美理念。它雅俗共赏,画面具有直接、形象、瞬间等特性。用线条、颜色和形体作为工具烘托人物形象是其重新构建形象的主要手段。

2. 话剧 《白鹿原》话剧有多个版本,经常被各艺术院校毕业汇演搬上舞台,如中戏版《白鹿原》、北舞版《白鹿原》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林兆华导演、濮存昕和宋丹丹主演的北京人民艺术研究院的版本。将五十万字的小说改编非常艰难,因为它已经不仅是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转换,而是需要将两代人几十年恩怨沉浮投射出的民族苦难史诗全部浓缩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和演出

[1]安海燕:《试析连环画版〈白鹿原〉中的人物服饰刻画方法》,〔石家庄〕河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1页。

时间之内<sup>[1]</sup>。这意味着必须将小说原有的结构彻底打碎,比如插叙、倒叙等,重新构建出一个更有逻辑的叙事框架,以免观众观看时产生迷惑之感,同时也方便现场布景和道具安排。小说构架非常自由,可以纵横捭阖,时空转换信手拈来,如此便于埋设线索伏笔,其中穿插描写议论更见作者文字技巧的娴熟程度。但是话剧注重“现在时”,要顺序叙述,脉络清晰,删减支线末节。因此话剧剧本必须梳理原著的时间线和人物关系,糅合成仅由时间来推动情节发展的故事,并尽量保留小说的精髓。这是话剧重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点。

基于上述缘故,贯穿小说始终的白嘉轩这个主人公形象在话剧中必须重塑,事实上在这个话剧版本中也正是如此。因为对诸多情节进行结合并以此迅速推动剧情,白嘉轩的形象立体感和层次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例如,话剧略去了他靠罍粟发家的背景,突出他不计前嫌让悔过后的黑娃进入宗祠祭祀的情节,他的算计被屏蔽了,剩下的是单一的仁义公道的形象。当然,我们不能将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归结于话剧表现形式本身的局限性,但必须要正视它对人物表现力有一定的桎梏。

话剧相比于小说多了“视”和“听”两种元素,这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也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视”表现为布景、灯光等舞台效果、角色打扮和动作神态,“听”表现为现场的音乐和台词。要使舞台上的白嘉轩更加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则离不开“视”与“听”的配合。濮存昕扮演的白嘉轩往往以一身黑色对襟长袍示人,用一口浓郁的陕西话召集族人宣布族规时,腰杆笔直地站在舞台中央,神色凛然,如此一个处事公正的乡贤形象就出现了。舞台上的角色重构与物质景观符号和声音符号密不可分<sup>[2]</sup>,这有赖于幕后工作人员的配合和演员扎实的演技。

3. 电视剧 2017年5月播出的电视剧《白鹿原》是原著唯一的电视剧版本。它于2001年获得改编授权,充分尊重原著,筹备了16年后搬上荧屏,后期制作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在赚快钱成为影视业运作法则的当下,可谓是匠心之作。

与话剧和电影不同,只要准备充分,电视剧基本不受时长和场地限制,更有可能展现小说全貌,原著中角色回忆的部分也尽可在剧中得到发挥。同时,话剧具备的视听元素在电视剧中得到了更广更深的扩展。“视”包括色彩、构图、服饰、妆容、场景和道具等,“听”包括片头片尾曲、插曲、音效、台词等。小说里的一句话在电视剧里就要丰富演绎成很多小故事,叙述语言到影像语言的转换使得人物角色的建构拥有更大的空间。

剧版中白嘉轩这个角色遵循了传奇化的手法,强化了矛盾冲突,这是视听媒介所必须的建构方式<sup>[3]</sup>。比如,剧里开头白嘉轩已经连续死了6任老婆,素有克妻之名,再一次上门提亲时,听闻女子拒嫁的哭声,于心不忍,都没见面扔下两袋粮食就走。后因机缘巧合救下一名女子叫仙草,她做事利落,深得白家人喜欢,白嘉轩不愿趁人之危娶她为妻。仙草却告诉他,自己就是当时拒嫁的女子,现在已经愿意嫁给他。电视剧也增加了一些幽默的情节,例如老对头白嘉轩和鹿子霖不得已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过程十分有趣。在最后一集增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景象:白灵的女儿回到原上,白嘉轩和鹿子霖共同为她荡起秋千。这些细节使得白嘉轩的形象摆脱了单纯的正直忠厚,富有人情味和象征意义。这样的重构尊重了媒介自身的规律性。

4. 电影 电影版《白鹿原》也只有唯一版,由王全安执导,由张丰毅、张雨绮、段奕宏等演员主演,该片筹备9年、拍摄3年,于2010年上映之后获得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金熊奖提名。

[1]胡薇:《探索民族化、个性化的戏剧表达——反思话剧〈白鹿原〉的创作得失》,〔北京〕《艺术评论》2013年第1期。

[2]高盛楠:《话剧〈白鹿原〉在符号学视域下的乡土本色与文化内涵》,〔西安〕《当代戏剧》2014年第2期。

[3]本刊记者:《从文学表达达到影像阐释的飞跃——电视剧〈白鹿原〉专家研讨会综述》,〔北京〕《中国电视》2017年第9期。

电影将白嘉轩怒打白孝文的情节放在开头,开门见山地塑造出角色的公正守序的性格特征,同时制造了戏剧冲突引人入胜。同时,对白嘉轩竭力阻止田小娥进祠堂的行为进行大肆渲染,突出了其顽固守旧的一面。他性格中的这一方面在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中或多或少地被美化了。

由于时间限制,电影保留了原作中的主要人物,删去了游离于白鹿原斗争之外的朱先生,将他的性格特点赋予在白嘉轩身上<sup>[1]</sup>。这种建构方式引来不少争议,许多原著迷认为充满智慧、高瞻远瞩的朱先生是全书的经典角色,随意砍掉,而按在白嘉轩身上已经扭曲了白的性格。另外,电影保留的每个情节都有极强的目的性,它舍弃了小说中神秘色彩部分,如驱鬼辟邪、白鹿显灵,使得白嘉轩的形象构建更加迅速,轮廓更加鲜明。

电影还通过镜头语言实现白嘉轩心理活动的外化。小说中,白嘉轩知道白孝文与田小娥的奸情后,来到窑洞门前验证。电影画面中,白嘉轩却站在了远处的山顶上,白孝文从窑洞出来的那一刹那,镜头随着他的目光拉成远景仰视拍摄,将白置于画面顶端,衬托出他的威严。和原本寄予厚望的大儿子对视后,他高大的身躯轰然倒塌。这一处可谓是白嘉轩形象建构的点睛之笔了,只有电影可以做到<sup>[2]</sup>。还有影片一开始,白鹿原要交的皇粮被抢,白嘉轩得知后匆忙跑出家门,此段采用手持摄影,通过镜头的不断晃动将他内心的焦躁不安完全展现出来了。白嘉轩与乡民们商量为田小娥建庙一事时,镜头为移动近景,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一览无余。人物都没有开口,观众就读出他们的立场,人物形象借助拍摄技巧愈加丰满<sup>[3]</sup>。

电影《白鹿原》还使用蒙太奇手法,将白鹿两家发生的波折对比呈现。一边是鹿子霖施计成功后假惺惺地问候遭受打击而腰折的白嘉轩,一边又切换成白嘉轩为年轻时换地向鹿子霖忏悔。这种对照手法更加反衬出白嘉轩坚守仁义的形象<sup>[4]</sup>。

除画面外,影片对关中方言俗语的使用也建构了白嘉轩的人物性格,使之更加生动。白嘉轩对婚后无子的白孝文说:“庄稼都收了几茬了,连买下的小牛都怀了牛犊了,你是咋回事!一点动响都没有。”短短几句朴实的话,就反映了他作为农民族长“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sup>[5]</sup>。

### 三、重构过程中的缺失

小说《白鹿原》以连环画、话剧、电视剧和电影的方式重新建构了白嘉轩形象,也使《白鹿原》中的其他人物形象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乡贤文学焕发出新的生机。但小说重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使得作品要么叫好不叫座,要么饱受批评。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物脸谱化 原著的每个人在历史的洪流面前,都有自身悲剧性,很难说清楚谁主谁次,谁善谁恶。除了连环画之外,其余三种改编形式都简化了角色的性格层次,出现好坏的尖锐对立。白嘉轩成为儒家道德的守护者,鹿子霖则是狡诈狭隘的伪君子。但是小说中,白嘉轩有隐秘的算计和私心,对待不守传统礼教的子女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专制冷酷。但他受到打击倒在雪地上时,鹿子霖一边骂自己心软,一边却将他救起。鹿善于结交,办事精明爽利,是村子里主心骨之一。他是一个慈父,对两个儿子有舐犊之情。他道德有亏,却总体上可以当得起乡绅之名。这些在话剧、影视作品中大都缺少铺叙和细节描写,走马灯似的交代它认定的主要情节,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就放大了,少了些许细腻,人物形象

[1]武瑾:《长篇小说影视改编的人物塑造探析——以电影〈白鹿原〉为例》,〔西安〕《今传媒》2014年第4期。

[2]张兴茂、黄清宝:《谁的牌坊——论电影〈白鹿原〉的改编得失》,〔贵阳〕《电影评介》2012年第24期。

[3]张晓如:《评王全安电影〈白鹿原〉的拍摄艺术》,〔长春〕《电影文学》2014年第4期。

[4]姚洪伟:《电影〈白鹿原〉中的叙事艺术研究》,〔长春〕《电影文学》2015年第18期。

[5]贺菊玲:《电影〈白鹿原〉的方言俗语与人物性格》,《西安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不够丰满。

2. 核心价值消解 原著记述了白鹿两家的斗争纠缠,通过个人命运的沉浮,侧面凸现出几十年的历史变革——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破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族信仰、传统文化、人性的幽深复杂是故事背后探讨的根本问题。改编的作品对原作深挖不够,最终变成在动荡时代中男女之间爱恨纠葛的故事。考虑到市场受众口味,突出男女爱恨情仇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妨碍将文学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精髓传递出来,找到流行和深度的平衡点<sup>[1]</sup>。

3. 地域符号程式化 电视剧和电影为了还原小说里关中地区的民俗特色,追求原汁原味的效果,会中断正常的叙事节奏,将镜头对准与剧情发展毫无助益的事物。电视剧中有仙草擀面、切面的镜头,对一碗热气腾腾的油泼面近景特写,并且多次远景呈现原上风光。这个画面一经播出,网友调侃这是“舌尖上的白鹿原”。电影中也有过多次吃面场景的程式化展示,把关中人的饮食习惯标签化了。电影还大量出现麦田、秦腔来表现关中人的粗犷豪爽。这些空镜头单独看非常美妙,但是主要功能是展示,放在前后连贯的剧情中就造成了事件进程的急刹车,显得空洞而莫名其妙,变成画面符号的堆砌<sup>[2]</sup>。这样的“讲故事”方式游离了主题。

#### 四、重构路径的再思考

乡贤文学的改编作品以全新的形象回归大众视野是消费市场的需要,也是乡贤文化建设的呼唤。文学重构的过程有创新,结果有口碑,但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改进的空间。内容上要注重文学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领悟作者的思想情感,用各种媒介特有的语言尽可能地表达深刻的核心意涵。如《白鹿原》中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如能在不损伤原旨的前提下保留下来更好。创设作品表达之外的新情节也未必不会成为神来之笔。形式上可以结合当今互联网传播的“短平快”特点,将作品中的故事拍摄成乡贤系列的水墨短动画或者公益广告。在改编的过程中也可借鉴湖南卫视《中华文明之美》节目。这档节目每期八分钟,围绕一个既严格又爱孩子的师父和两个搞笑逗趣的学童展开,用课堂的形式串通古今中外的经典故事,寓教于乐,贴合时事热点。或者在像《朗读者》这样的电视节目中诵读乡贤文学的经典片段,对内容重新解读,邀请嘉宾讲述自己家乡的乡贤故事。作品“接地气”,受众才好吸收。

乡贤文学的重新构建充满挑战,在路径的多样性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性之间把握平衡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怎样利用媒体自身的特点又准确把握原著博大精深的精神内核?这是以后文学重构过程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平 啸]

[1]周勇:《当意象解构为影像——关于电影〈白鹿原〉的改编得失》,〔石家庄〕《大众文艺》2014年第10期。

[2]潘桦、巩杰:《诗性智慧与诗性品格的缺失——以小说为参照分析电影〈白鹿原〉》,〔北京〕《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